

“现代现实主义”的魅惑：蒋承勇现实主义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意义

The Allure of “Modern Re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iang Chengyong’s Studies on Realism

曾照智 (Zeng Zhaozhi) 曾繁亭 (Zeng Fanting)

内容摘要：在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现实主义既长期占据核心位置，又始终处于概念模糊与评价分歧之中。系统地梳理其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对现实主义问题的持续探究，不但是贯通蒋承勇先生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也是其学术风格与特色的鲜明标记。通过区分基于“摹仿说”的传统写实观念与在科学理性语境中生成的“现代现实主义”，他突破了将现实主义等同于表层再现的僵化理解，将其提升为一种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文学观念与认知范式。在研究路径上，他坚持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结合文学思潮史与自然科学史的跨学科视角，揭示了现代现实主义在19世纪现代文化结构中的生成机制及其内在张力。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不仅深化了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现代性的理解，也为中国现实主义文论的反思与重构提供了富有历史深度与现实指向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蒋承勇；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曾照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文化产业、现代西方文学与文化；曾繁亭，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学与科学的关系。

Title: The Allure of “Modern Re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iang Chengyong’s Studies on Realism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alism has long occupied a central position, yet it has consistently been marked by conceptual ambiguity and divergent evalu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Jiang Chengyong’s significant research on realist literature makes it clear that his sustained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realism is not only a central thread running through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his academic career, but also a distinctive hallmark of his scholarly style and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he traditional realist concep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mesis* from the “modern realism” gener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Jiang breaks through the rigid understanding that equates realism with surface representation, elevating it to a literary concept and cognitive paradigm endowed with modern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approach, he consistently proceeds from specific authors and works, integ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rom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movements and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thereb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odern realism emerged within the modern cultural structur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well as its inherent internal tensions. Jiang’s research on realism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ity of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realism,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oint of reference with considerable historical depth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r the reflection up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alist literary discourse in China.

Keywords: Jiang Chengyong; realism; modern realism

Authors: **Zeng Zhaozhi**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as well as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1037135350@qq.com). **Zeng Fanting**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Email: fantingzeng@163.com).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宏大图景中，“现实主义”无疑是一个在场感最强、却又最难以被简单定性的核心概念。“现实主义是在我国本土文学与文化领域传播最为深入而广泛的，但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内涵最具复杂性或多变性的文学思潮”（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1）。现实主义概念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其充满张力的接受史上：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作为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思想资源被引入中国，并在随后的革命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被赋予了奠基性的正统地位，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带来了本土文学观念的剧烈震荡，现实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遭遇到很大程度的“污名化”——屡屡被指认为“过时”“保守”“陈旧”“贫乏”“无效”。¹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激烈拉锯中，现实主义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悖论状态：它既未真正退出理论舞台，甚至依然占据着主流话语的中心，却又始终难以获得一个既符合文学内在规律、又具备当代解释力的稳定理论定位。始终绵延不绝、不

1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4-36页。

时激烈爆发的现实主义论争，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理论困窘：它被反复言说，却似乎越说越不明晰；它被不断批判，却又像幽灵般无法绕开。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新文学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现实主义堪称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难以规避的一个元问题。

一、问题意识与“现代现实主义”命题的提出

对现实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悖论之清醒认知，乃是蒋承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关注、深入研究现实主义问题的内在动力。此种清醒认知与其热诚的现实关怀初心相结合，便有了他贯穿近半个世纪的理论自觉与坚守。

现实主义概念的混乱，并不全然是其在本土传播过程中因误译误读乃至歪曲附会的结果。事实上，在其西方故乡的文化语境中，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始终具有弹性。在与现代主义论战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Georg Lukács）在《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 On European Realism*, 1964）等著述中着力捍卫现实主义的纯洁性，认为真正的艺术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用现实主义成规否定现代主义的做法，显现了其现实主义观念的保守性¹；与之构成对照的是，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则主张用无限扩大现实主义语义疆域——直到这个概念“无边”到能够容纳各种新的艺术经验——的方法来捍卫现实主义，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其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On Boundless Realism*, 1963）一书中坚称：作为“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167），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因此，设若不能否认毕加索、卡夫卡的作品是艺术，则他们就必定是现实主义的。此等逻辑，事实上几乎是取消了现实主义。而作为一位对“主义”术语无兴趣的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1942）阐发的是以“摹仿说”为内核的西方现实主义传统，但书中奥尔巴赫并没有详细或精确地界定什么是现实主义。在其表述中，从荷马到现代主义的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更不用说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者左拉，这些经典作家似乎都是现实主义者；而西方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作家体察和再现生活世界的视角、手法有所不同。在谈到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时，奥尔巴赫写道：“有些作家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叙述）方法（……）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脱离外部现实的途径，其目的就是对现实做出更为多样、更关涉其本质的说明”（545）。显然，对奥尔巴赫来说，现实主义的焦点是人类生活的现实性与真实性，其基本文学观念乃是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个命题——文学即对现实的摹仿或再现。

1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7页。

对于自己难以放下的现实主义问题，蒋承勇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开放而又审慎的历史主义态度。他并未将现实主义视为一个可被一次性界定或封闭的静态文学范畴，也就不会满足于将其简化为某种特定的创作技巧或风格流派。相反，他明确将其理解为一个需要在历史变动、思想冲突与理论更新中不断重新加以阐释的动态问题。这一思想立场具有针对性——直接挑战了那种将现实主义本质化、教条化的倾向。事实上，作为西方的伟大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在西方语境中乃是一个趋向于“无边”的“常数概念”¹；作为“常数”概念，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核乃肇始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蒋承勇强调19世纪现实主义绝非古代“摹仿说”的简单延续，不能将其等同于那种基于朴素反映论的“写实”传统，在《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文学思潮，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显然不同于此前基于‘摹仿说’传统而具有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如果说此前这种‘摹仿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被称为‘摹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19世纪现实主义则可被称为‘现代现实主义’”（49）。这一从奥尔巴赫、斯特林伯格（Roland N. Stromberg）、贝克（George J. Becker）等人关于“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表述中引申出来的界定，实际上为蒋承勇的整个现实主义研究奠定了根本的思想立场：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僵死的历史标签，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持续生成、不断变形且充满现代性张力的文学精神与理论系统。这一辩证的区分，不仅厘清了本身便多意的现实主义概念的边界²，更指出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不再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镜鉴式模仿，而是试图借助科学理性的光照，深入到社会与人性的肌理内部进行解剖与分析³。正因如此，对现实主义的研究，绝不能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概念界定层面，而必须回到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本身，通过细读文本来把握其深层的精神结构与思想内涵。

二、现代现实主义的“现代性”

具有个人特色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旨趣，使蒋承勇对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情有独钟，并构成了其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鲜明标记。从上个世纪末的“现代阐释”⁴到近年来“现代现实主义”概念的厘定，近半个世纪以来，蒋承勇对现实主义问题的研究矢志不渝，始终围绕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品格做持续不断地深入阐发。基于大量作家作品研究的例证与文化比较研究的论证，他

1 参见曾繁亨：《文学自然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9页。

2 蒋承勇认为“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含义，它“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概念，又是一种以写实原则为根基的创作倾向、创作方法或批评原则”。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2019）：161。

3 参见蒋承勇：“自然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2022）：169-181。

4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坚持认为现实主义本身就内含着深刻的现代性因素，它是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最早且最为深刻的展演。现实主义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对人性观念的重塑、对社会结构运行机制的解剖以及对客观真理的执着探索，构成了现代文学得以生成的“前史”和基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与‘真实性’品格，以及作品中所展示的现实关怀与呈现的历史风格，已深深融入人类文学并成为其本质属性之一，是文学生命活力的重要泉源”（“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159）。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当然就不是现代性的“过去时”，而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与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判断拓展了现实主义研究的理论视域，使其不再停留于文学风格或创作方法的技术层面，而被提升到文学本体论的高度，成为理解现代文化结构与现代人精神处境的重要理论切口。

大致说来，蒋承勇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大论战。由此出发，既拒绝现代主义的大潮卷裹又不认同现实主义的正统僵化，他对现实主义问题的关注自始至终均聚焦于其现代基因的审视与辨析。在脱胎于其硕士论文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一书的导言中，他对该书的要旨做了这样的说明：“在本书中，笔者既努力论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化基因上与现代主义的血缘关系，也客观地阐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初露端倪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倾向”（5）。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问题上，蒋承勇既不认同将19世纪现实主义视为20世纪现代主义的对立面或被其超越的对象，也不接受那种用断裂的逻辑来理解文学史演进的简单叙述——即认为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彻底否定。在他看来，将文学史理解为由若干相互割裂、彼此替代的思潮构成（如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在简化处理中歪曲历史的叙述模式。文学思潮之间并非简单的“兴起-高峰-衰落-被取代”的线性更替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在继承、修正、对话与反拨中不断展开的复杂互动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蒋承勇明确指出：“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与真实性品格及其在作品中展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呈现风格，已深深地融入人类文学并成为其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类文学之生命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具有艺术魅力与价值之永久性与永恒性。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且永远不会‘过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 2）。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将现实主义从一个历史阶段提升为文学的本体属性，为其反对“现实主义过时论”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与文学史依据。

事实上，蒋承勇从未否认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挑战与革新。相反，他通过系统梳理现代主义批评话语，指出现代主义的诸多实验性创作实践与批评话语，恰恰是在与现实主义的持续对话中生成的。无论是意识流写作对心理真实的极致追求，还是新小说叙事视角的碎片化对世界复杂性的回

应，其深层动因都与现实主义在再现复杂现代经验方面所遭遇的内在张力密切相关。因此，将现代主义简单理解为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不仅忽视了文学实践的复杂性，也遮蔽了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分析文学思潮的历史连续性时，蒋承勇尤其反对将 20 世纪现代主义与 19 世纪现实主义彻底断裂开来的表述。他坚称从来都不存在与传统彻底割裂开来的创新，“文学史的发展，不存在割裂传统基础上的纯粹‘创新’与‘先进’，而永远只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与延续”（《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2）。这一判断，不仅构成其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核心立场，也深刻影响了其对文学思潮史的整体书写方式。在这一框架中，现实主义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淘汰的历史阶段，而是一种持续参与文学演进、并在与其他思潮的博弈中不断更新自身的基本文学原则。

三、方法论鼎新：“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

基于深邃的问题意识，蒋承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范式转换。他并未沿用传统文学史教科书中常见的“流派-特征-代表作家”的线性叙述方式——这种叙述往往容易滑向一种简单的进化论逻辑；相反，他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前移，深入到现实主义概念本身的历史生成机制与文化语境之中。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本土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长期受到理论移植与话语功能化的双重遮蔽，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写实方法或反映现实的文学原则，甚至被工具化为服务于特定社会政治目标的宣传策略。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解，虽然突出了现实主义的社会功能，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在 19 世纪西方文化结构中深厚的思想背景、复杂的人文意涵以及内在的现代性焦虑。基于此，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拒绝从抽象的先验理论预设出发，对丰富复杂的文学实践进行裁剪式或图解式的阐释，而是坚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将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概括建立在对 19 世纪具体作家与作品细致的考察与深入的剖析之上，即坚持经由对作品所呈现出的精神困境、审美矛盾、叙事裂隙以及思想张力的细致文本分析，来剥离附加在现实主义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遮蔽，重新还原并理解现实主义的历史形态与理论潜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并非一种超历史的、固定不变的文学范式，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由一系列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试探、修正、突围而最终动态生成的文学形态。¹ 这一判断为其现实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内在的规定：现实主义研究若脱离开具体的作家与作品，则必然会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陷入概念自足的理论循环——作家作品不是用来印证既定理论的注脚材料，而是理论得以生成的逻辑起点。

“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并不等同于全景式的文学史铺陈。在上世纪

1 参见蒋承勇：《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537 页。

末叶的现实主义问题研究中，蒋承勇精准选择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经典之作进行个案剖析¹，在系列定点“爆破”后再小心翼翼地做局部的概括性收结。这种选择并非基于文学史的“经典名单”排列，而是源于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些作家的创作实践，集中体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所面临的共同精神困境。蒋承勇反复强调，他们并非仅仅致力于再现社会现实的表象，而是在理性、道德、自由与人性等根本问题上展开了持续而艰难的文学探索。例如，在对司汤达现实主义特质的阐发中，蒋承勇并未将其简单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或性格描写的传统框架，而是着力揭示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自由困惑。在拿破仑时代终结、旧有等级秩序崩解而新秩序尚未确立的历史间隙，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却同时失去了稳定的价值参照。这种自由并未带来预期的解放，反而转化为持续的内心焦虑与不安。于连的野心与毁灭，就绝非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现代主体在获得自由后陷入茫然无措的生存寓言。²“个人主义小说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捍卫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Winfried Engler 2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将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对现代主体处境的早期揭示，而非单纯的社会写实。经由诸多经典作家作品的个案剖析，蒋承勇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一书中逐步勾勒出19世纪现实主义的整体精神风貌：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文学流派，而是一种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与现代经验冲突中不断调整自身形态的文学实践；它既继承了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精神，又在具体创作中敏锐地意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既试图通过真实再现理解社会，又不断遭遇现实无法被整合的裂隙。由此，蒋承勇将19世纪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形态。他指出，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仍深植于传统的人文理想之中，另一方面却在无意中为现代文学的生成完成了“原始积累”。现实主义在其内部孕育的精神困惑、审美矛盾和思想裂隙，最终成为20世纪文学不断展开的重要资源。³

在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历来是屯集研究力量最多的文学史研究的主战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与此相比，国内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较为堪忧：西方文论研究与西方文学研究两条线脱节，文论研究者往往沉溺于观念的推演，文学研究者则习惯于以点为面，就作家谈作家，就作品论作品；而近几年受西方影响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又大都停留于观念翻新的泡沫状态。经由对作家作品的细致重读，蒋承勇克服了现实主义研究中常见的两种偏向：一是将现实主义简化为技术层面的写实

1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3页。

3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3-394页。

方法，二是将其凝固为某种规范化的文学模式。“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使其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提炼出具有概括力的理论判断，助其发掘出尚未被发现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奥秘，达成对既有历史事实的穿透性理解，现实主义因此既保有了其历史具体性，又获得了理论开放性。理论阐发与文本分析紧密结合，既体现了理论性见长的特点，又以实例相印证不流于空泛。¹这种“从作品中生长出理论”的研究路径，使蒋承勇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论标识。

四、跨学科阐发的范例：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

如果说在其上世纪末的早期研究中，蒋承勇主要是通过具体作家与作品的微观研究生成对现实主义之“现代性”的理论阐发，那么在《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一书中，他则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学思潮史或文学观念史的整体与宏观层面，达成了其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突破。在其近年发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大量成果中，不难发现：现实主义不再仅仅作为一组孤立作家的创作实践而存在，而是被置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西方文学演进的历史长河之中，成为理解文学史连续性、变异机制以及现代文学精神谱系的重要枢纽。基于对文学史叙述逻辑本身的深刻反思，蒋承勇重新界定了现实主义在西方现代文学版图上的位置。这一成就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应归诸比较文学跨学科阐发的成功实施。

与传统研究往往局限于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文学风格、修辞技巧或叙事方法不同，蒋承勇明确主张将现实主义置于19世纪整体的文化与知识结构之中加以考察。他敏锐地发现，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更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感知结构。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科学理性，在塑造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认知方式和审美原则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宏阔的跨学科视角下，蒋承勇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来重新界定19世纪现实主义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内涵，从而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现代性的知识考古。

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以“摹仿说”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称为“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科学精神浸润下产生的19世纪现实主义则可称为“现代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为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所鼓舞，并汲取其思想、理念与方法之精髓以滋养自身的文学创作。其中，科学类比与科学实证方法让现代现实主义作家把文学创作视作对人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实验，追求文学文本在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与“写实

¹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性”，从而全面改造了传统“模仿说”意义上的“古典现实主义”，达成了“现实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现实主义是19世纪自然科学在当时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大果实。（“自然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169）

这一判断具有理论魄力，它不仅为区分混淆已久的古典现实主义与现代现实主义提供了清晰的理论依据，更深刻揭示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现代性”本质——即它是一种在科学理性光照下生成的、具有现代知识型特征的文学形态。显然，科学视角的系统引入，已然构成了蒋承勇现实主义阐释体系中最具原创性与穿透力的维度。因此，现代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是文学面对科学理性崛起与传统价值秩序崩塌的一种回应，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其独特的现代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命题。

在蒋承勇看来，19世纪自然科学对于文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等具体知识成果的积累，更在于它所塑造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理性风格。在这一时期，科学逐渐取代了宗教与形而上学，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社会乃至自我的主要认知框架；因果关系、历史进程、经验事实和实证方法，取代了神意与天命，成为判断真理的新标准。科学理性不再局限于物理、化学等专业领域，而是以一种总体性的文化霸权力量，强力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作为重要的人文实践形态，自然无法置身于这股时代洪流之外。作家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眼光去打量世界，试图让文学也能像科学一样，提供关于人类生存的确凿“知识”。在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现实主义的核心范畴“真实”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真实”，不再意味着对现象界外在在表象的逼真再现，而是指向对现实深层运行机制与因果律的理性揭示。蒋承勇指出，正是自然科学所强调的观察、分析、归纳和因果探究，使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论合法性。¹

在阐发科学如何具体影响现实主义文学时，蒋承勇并未采用简单的反映论模式（即文学被动反映科学成果），而是精辟地提出类比方法作为连接二者的关键中介机制。他指出，自然科学并非以直接移植实验技术的方式进入文学，而是通过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类比，对文学思维方式产生深层塑造作用。现实主义作家通过类比生物学家、解剖学家或医生的研究工作，将文学创作理解为对社会机体与人类行为的系统性观察和分析。这种类比赋予了文学以新的认知功能：它不再是虚构的谎言，而是关于社会的“自然史”。²在对巴尔扎克的阐释中，蒋承勇并未将《人间喜剧》视为简单的社会全景再

1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3-234页。

2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15-217页。

现，而是强调其背后所蕴含的结构性思维与科学分析精神。《人间喜剧》也非单纯的社会风俗画集合，而是在当时博物学（特别是居维叶与圣希莱尔的论争）和生物学思维的深刻启发下，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同类型、阶层和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金钱逻辑在巴尔扎克笔下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渗透进人物性格、伦理选择和命运轨迹的内在机制。这种将人视为社会动物的冷峻视角，正是科学理性进入文学的直接体现。文学家就是社会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小说就是他们的实验室。现实主义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分析性的文学实践，其目标不在于复制现实表象，而在于揭示现实运行的深层规律。

通过对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关系的系统阐释，蒋承勇成功将现实主义问题从文学史内部的风格演变推进到现代性文化结构的深层生成机制层面。现代现实主义不再只是 19 世纪的一种文学样式，而被理解为现代社会在科学理性主导下，对“现实”“真理”与“人”的整体回应方式。在这一意义上，现代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史现象，更是理解现代文化精神转型的重要切口。显而易见，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综合性与跨学科特征——并非局限于文学史内部的风格演变或文本互涉分析，而是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引入科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广阔视角，将现实主义置于 19 世纪整体知识结构与理性风格之中加以考察，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文学研究的内部循环，使现实主义不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成为理解现代社会如何认识现实、如何建构真理的重要文化实践。毫无疑问，此种跨学科比较阐发，不仅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回应跨学科问题、如何处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文学研究不应仅仅是审美的鉴赏，更应是文化的考掘与思想的对话。

五、蒋承勇现实主义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启示

G.H. 刘易斯 (G. H. Lewes) 在 1858 年 10 月为《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断言：“现实主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它的对立面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无需证明的谬误”（转引自 Becker 6）。作为“一切艺术的基础”，现实主义绝非一个已然完成的封闭文学形态，而是一种始终处于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开放的文学问题。在蒋承勇看来，现实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仍具有讨论价值，恰恰不在于它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固定的、不可动摇的创作规范被继续沿用，而在于它是否仍然具备被不断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并回应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这让人想起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的论断“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重大政治、哲学和实践问题，必须作为一项关乎人类普遍利益的问题加以研究和阐释”（转引自 Simon Dentith 39）。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堪称是对布莱希特这一深刻论断的绝妙注释。

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从未止步于西方文学史的梳理与阐发，而是始终具有强烈的本土关怀，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当代文论话语

的论争。他敏锐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绝非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与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对社会进步、民族救亡与文学功能的整体期待密切纠缠在一起的。这一深刻的历史洞察，源于其对这一时代进程的回溯：现实主义于“五四”前后传入我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本土特定的文化期待视野与社会政治情势等原因，影响力不断增强，其话语的内涵也不断变化。¹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现实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其“独尊”“至上”的正统地位，成了衡量文学价值的最高尺度；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观念的压缩、变形乃至异化。既不否认现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也不回避其在特定话语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理论局限，这种辩证的态度，使其研究避免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显得更为厚重、公允。因此，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并非一种价值立场上的简单辩护或怀旧，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反思意识与理论建构指向的创造性学术工程。在近期的系列论文与著述中，他反复强调：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借助各种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手段对现实主义做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撑。²

总体观之，蒋承勇对现实主义研究，并非停留在概念史或流派史的表层梳理，而是始终将其置于文学史整体结构与中西文化碰撞的语境之中加以考察，现实主义因此不再被限定为某种固定写作模式，而被理解为一种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现实复杂性的开放性文学立场。就此而言，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很大程度上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历史校准机制。它提醒研究者，任何试图超越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都必须首先回应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文学如何认识现实？如何处理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审美形式与认知功能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理论潮流的更迭而自动消失。在当今这个信息碎片化、真相后置的时代，坚持现实主义的求真精神与理性品格，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

蒋承勇的现实主义研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介性理论实践：它既连接了19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搭建起持续对话的可能性。通过这一中介，现实主义不再是一个被固化的历史标签，而重新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与生长性的理论概念。他独辟蹊径的现实主义研究与秉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不仅为本土学界重新理解现实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持，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处理“传统-现代”“西方-本土”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其“现代现实主义”的

1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1-18页。

2 参见蒋承勇：《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37页。

理论创新，不仅使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一种开放且富有弹性的理论定位，同时也绽放出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蒋承勇从未满足于对过去的梳理，而更致力于展望未来。他认为，新时代的本土现实主义应当是一种能够平衡理性与感性的“新形态现实主义”——既富有理性规约，又不无感性浸润的开放性，既不像伪现实主义那样排斥现代主义的技巧，也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消解深度与意义。¹

Works Cited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
- Becker, George J. "Introduction: Modern Realism as Literary Movement." *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edited by George J. Beck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63. 3-38.
- Dentith, Simon. "Realist Synthesi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That Unity Which Lies in the Selection of Our Keenest Consciousness'." *Adventures in Realism*, edited by Matthew Beaumont. Oxford: Blackwell, 2007. 33-49.
- Engler, Winfried. *The French Novel: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Gode.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0.
-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 [Garaudy, Roger. *On Boundless Realism*, translated by Wu Yuetia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6.]
- 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Jiang Chengyong.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t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 ：“自然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2022）：169-181。
- [—."Natural Science and 'Modern Real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m." *Social Science Front* 2 (2022): 169-181.]
-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2019）：159-181。
- [—."The 'Representational' Tradi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t Liter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2019): 159-181.]
- ：《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二）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I): Real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2.]

1 参见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2019）：178。